



宋濂对明初外交的贡献

连德兰, 陈昌云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淮安 223300)

摘要: 明初不断完善外交体系, 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外交成就举世瞩目。除却朱元璋的亲力亲为外, 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也在明初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 值得关注。作为台阁重臣和儒学大师, 他担任帝王政治顾问, 积极参与外交决策, 代拟外交诏令, 分管外事工作; 身为著名作家和文化大使, 他在国内外文坛和宗教界声名显赫, 与各国外交使臣、宗教人士、文化名人交往密切, 享誉海外。凭借政坛威望和道德文章, 宋濂在奠定明初外交准则、构建外交体系、优化外交方式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有力推动了明初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流事业发展。

关键词: 宋濂; 明初政治外交; 文化交流; 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10-0525-06

Song Lian's contribution to the diplomacy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LIAN Delan, CHEN Changy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300,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by perfecting the diplomatic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addition to Zhu Yuanzhang's (Emperor Taizu of Ming Dynasty) efforts, it's worth noting that the Founding Minister Song Lian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plomacy in early Ming Dynasty. As an important minister and Confucianism master, he also served as an adviser to the emperors, took active part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drafted diplomatic edicts, and took charge of the foreign affairs. As a famous writer and cultural ambassador, he was well know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olitical, literary and religious circles, closely contacted with foreign ministers, religious figures, cultural celebrities, and enjoyed a high reputation. With his political prestige and moral writings, Song Lian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diplomatic principle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lete diplomatic system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s, and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iplomac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Key words: Song Lian; political diplomacy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cultural exchang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鉴于元朝疯狂对外武力扩张之失, 朱元璋在构建明初新型对外关系时, 推崇儒家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 将保境安民、和平共处作为明初外交的基本准则, 从而为大明王朝营造良好的外部关系。学界现

有相关研究多将明初外交成就归功于朱元璋的宏观决策和各国使臣的勇于实践, 万明的《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1]主要分析朱元璋制定明初“不征”外交原则的历史原

收稿日期: 2020-03-11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7-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ZW106)

作者简介: 连德兰(1970—), 女, 高级教师, 硕士, 主要从事明代文学与语文教育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陈昌云, E-mail: chenchangyun123@126.com

因;山东大学来涛的硕士论文《明初对外政策研究》^[2]全面论述朱元璋制定的一系列外交指导原则、具体制度和实施方案。两文都充分肯定朱元璋对明初外交的决定性影响,但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外交贡献关注不够。除了谢其祥在《论宋濂对朱元璋父子的教育与辅导》^[3]一文谈及宋濂经常给朱元璋讲解儒家经典要义,用儒家经邦治国之道影响朱元璋的政治思想和治国决策之外,目前尚无专文讨论宋濂的外交成就。事实上,宋濂对明初外交事业贡献很大,作为台阁重臣,他主修礼乐制度,充任帝王儒学顾问,参与外交决策,代拟外交诏令,分管外事工作;身为文化大使,他与各国外交使臣、文化名人、宗教人士交往密切,其政坛威望和道德文章不仅赢得明初君臣普遍赞赏,而且传誉日本、安南、高丽等汉文化圈国家^[4]。本文将从协助外交准则确立、参与政治外交与文化外交作为、历史影响与作用等方面分析宋濂对明初外交的贡献。

一、深刻影响明初外交准则确立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己任,在内政外交上积极推行儒家治国方略,最终确立“以和为贵,怀柔远人”的和平外交指导思想,并将其写入《皇明祖训》,成为明代的外交基本准则。宋濂对此外交原则的确立影响巨大,他是明初儒学的代表人物,十分推崇儒家的仁政治国策略,他在主修《元史》时感慨:“自古国家上有宽厚之君,然后为政者得以尽其爱民之术,而良吏兴焉”^{[5]7738},认为君王当宽厚仁爱,为政多施爱民之术,形成明君良吏的清明政治。宋濂还认为“圣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则众事无不正,犹将百万之卒在于一帅。帅正,则靡不从令。不正,则奔溃角逐,无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敌哉?大哉心乎!正则治,邪则乱,不可不慎也”^{[6]1878},非常看重伦理教化、政令民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宋濂不仅信奉儒家治国理念,还经常利用“恒侍左右,备顾问”^{[7]3784}的翰林学士身份不断向朱元璋进讲儒家的仁政思想、华夷观念和民族怀柔政策。《明史》曰:“濂则从容辅导。于开国之初,敷陈王道,忠诚恪慎,卓哉佐命臣也。”^{[7]3792}意指宋濂用儒家的治国理念影响朱元璋外交思想。元至正二十二年八月,“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7]3785}元至正二十五年,“上问:

‘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请读真德秀《大学衍义》。上览而悦之,令左右大书,揭之两庑之壁,时睇观之。”^{[6]2591}明洪武三年,“上御东阁,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传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上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8]961}可见宋濂宣扬的儒家仁政思想对朱元璋的治国理政方略产生深刻影响。

宋濂非常受朱元璋赏识,这使得他在明初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受其思想影响,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就改变元代以武力攻伐为主的对外政策,明确和平共处、保境安民的外交治国方略。洪武五年三月,“上谓中书省臣曰:‘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8]1314}鲜明体现儒家的平等友好外交思想。洪武四年九月,朱元璋明确提出明初外交基本准则:“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患中国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8]1277}朱元璋所列举隋征琉球之事与宋濂业师吴莱在《论倭》文中反对元廷对东夷用兵所言:“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国,掠其人不可以强兵,徒以中国之大而使见侮于小夷,则四方何所观仰哉,……隋尝浮海伐留仇矣,拔其城数十而国不加益”^[9]内容基本相同。宋濂曾手编老师文集,一生谨记吴莱教导,完全可能将此意见上报给朱元璋,影响其东亚外交思想形成。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又将和平友好外交准则写入《皇明祖训》之中,并列15个亚洲邻国为大明的“不征之国”,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无故侵犯。至此,朱元璋构建的以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政治理想完全成熟,明代以和平稳定为主的外交准则已经定型。

二、在明初政治外交中积极作为

宋濂是明初台阁重臣,深得帝王器重,明朝开国礼乐典章制度多由其主持修订,他还充任帝王儒学顾问,代拟诏令文书,分管礼部外事工作,在构建明

初政治外交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宋濂利用担任翰林学士、礼部主事、翰林承旨等职务之便,积极宣传、认真执行明初外交政策。他经常参与朝廷外交决策,多次受命代拟、润色外交诏令,代圣意立言,得以广泛宣传明初怀柔抚恤的外交方针。现存诏令中已确认宋濂代作身份的有《谕中原檄》《代祀高丽国山川记》《奉制谕安南国诏》《皇太子与高丽王书》等文,这些诏令大力宣扬大明王朝对海外邦国的宽厚仁爱之心。如《谕中原檄》云:“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6]70},充分彰显洪武朝奉行的不歧视外族、各民族平等共处等外交基本原则。

二是宋濂直接负责外交工作,亲自管理外交事务。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和平外交政策,洪武四年十一月,朱元璋调任宋濂担任礼部主事,让其直接分管洪武朝外交外事工作,其中原因除恩宠信任之外,更多出于他们外交策略具有共识。宋濂就职礼部期间,经常与朱元璋商讨外交策略,制定具体的外交礼仪准则,出席接见外交使臣活动,推荐外交使臣人选,为构建明初外交体系做出重要贡献。《明史》云:“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7]3787-3788}宋濂担任礼部主事时间不足两年,却事事用心尽力,受到君王的赞赏和各国使臣的尊敬。期间恰逢真腊国、暹罗国、爪哇国、三佛齐国、吕宋国和浡泥国相继来明朝贡,他都直接负责接待使臣,主持外交谈判,做了大量具体外交事务。他还推荐好友担任使臣:“癸丑,遣翰林待制王祎偕苏成贵诏谕云南”^{[8]1314},积极为外交工作献策献计。虽然不属于国家外交层面的交涉,但也不能仅仅视为一般文人的个人酬唱。可以说,无论是赵秩还是妙葩,限于当时的处境,都有意通过个人诗文唱和的方式,探寻建立明、日之间国家层面交往关系的途径。

三是宋濂与外交使臣、来华僧侣密切交往,既建立良好的外交人际关系,又宣扬天子“威德”和大国气象,有利于外交工作的开展。宋濂在明初声誉较高,方孝孺称他“而近则朝廷,远则穷山陋邑,妇人稚子皆知公为盛德君子”^[10]。朝廷使臣乐于与之交往,宋濂与洪武朝礼部尚书陶凯、牛谅共事多年,经常诗文唱和,私交甚好,便于他为外交事务献计献策。宋濂也与出使安南的张以宁互称文学知己,张出使途中为他作《潜溪后集序》,而宋濂更是夸赞他

不畏外夷、誓死维护大明礼仪的外交气节。宋濂还为出使越南的王廉和林弼分作《南征录序》和《使南稿序》,赞扬他们不辱使命的外交经历。考功监丞华克勤成功出使日本,宋濂作《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出使过浡泥国的福建行省都事沈秩拜访宋濂,宋濂根据其经历撰写《浡泥入贡记》。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了解洪武朝外交状况的珍贵史料。

宋濂也与国外使臣交往颇多,成为文友。因宋濂文名远扬,外国使臣以求得宋濂文字为荣。《明史》云:“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7]3788}可见宋濂受国外人士尊敬和欢迎的程度,连朱元璋都感叹“方今四夷皆知卿者”^{[6]2350}。在朝廷准许情况下,宋濂都热情为外国使臣作序赠文。安南使臣杜舜卿来访,他作《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6]442};朝鲜使臣张子温回国,他作《赠高丽张尚书还国序》^{[6]441};日本使臣绝海中津受老师义堂周信托付,通过明使华克勤向宋濂求作《日本梦窗正觉心宗普济国师碑铭》^{[6]1117};宋濂还为汝霖良佐作《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后》;为廷用文珪作《日本瑞龙山重建转法轮藏禅寺记》^{[6]168};为简中原要作《赠简中要师游江西偈并序》^{[6]586}等文。外国使臣得其只言片纸视若珍宝,传阅海外。

宋濂也多结海外僧侣为方外之交。来华僧人多担负外交使命,也喜欢交流佛学,学习大明先进文化,宋濂与僧人使臣交往,既严守“人臣无外交”的原则,又与他们谈禅论道。来华僧侣多仰慕宋濂的儒佛道造诣精深,纷纷向他求教。洪武六年,早在元末就来华的日僧范堂令仪担任南京蒋山寺“掌藏史”,名扬佛教界。宋濂与之长期交往,引为方外知己,曾应邀为他作《赠令仪藏主序》,还为其师作《日本建长禅寺古先原禅师道行碑》。日本使臣也多次通过范堂令仪向宋濂求文,如廷用文珪通过他请宋濂作《日本瑞龙山重建转法轮藏禅寺记》,简中原要委托他向宋濂求作《赠简中要师游江西偈序》。日僧秀涯全俊居大明期间,宋濂也与之诗文唱和,诗曰:“自从离却日东国,随影江南湿翠间。满地落花春似海,不知犹忆五龙山。”秀涯全俊也和诗云:“一回错买离乡舶,抹过鲸波万里间。震旦扶桑无异土,参方饱看浙中山。”^{[11]244}宋濂有《赋日东曲》十首,据说就是为送别日僧绝海中津回国而作。

四是宋濂为明朝树立廉洁奉公的外交官员形象。宋濂不仅自身品德高尚,而且严守外交纪律,“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币乞宋景濂碑

文”^{[12]377},但宋濂认为“人臣无外交,非奉敕旨,不敢遽从所请”^[6]1117,所作多经帝王恩准。焦竑《玉堂丛语》载:“日本使奉敕请文,以百金为献,先生却不受。上以问先生,先生对曰:‘天朝侍从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国体也。’”^{[13]163}日本文人由此对宋濂人品敬佩不已。朝鲜著名文人任宪晦也云:“宋濂大书于门口曰:‘宁可忍饿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又铭于楹曰:‘积高山之善,尚未为君子,贪丝毫之利,便陷于小人。’余贫者也,恐或趋得,书宋公二言以自励。”^{[14]198}金钟正、金相日等人也纷纷引用宋濂的自律名言以自勉。

通过与外交使臣和来华僧侣的亲切交往和诗文唱和,宋濂及时了解明初亚洲诸国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思潮,并积极向外交使臣宣传大明王朝的外交政策,展现热情友爱、平等互谅的外交风范,为制定合法得体的外交礼仪规则积累经验,促进明初外交制度的合理化和规范化。此外,通过文学交流活动,来华人士耳闻目睹宋濂的文才学识和高尚人格,他们回国后广泛宣传宋濂的道德文章,进一步扩大宋濂的域外知名度。

三、推动明初外交文化繁荣

汉唐以来,日本、高丽、安南等国一直学习中土先进政治制度,各国民间的儒道佛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宋濂虽然没有出使国外,但在与各国使臣和民间来华文人的交往中,积极传播明朝先进的政治管理制度和传统的儒道佛思想,有力促进明初的文化外交事业发展。

明初,高丽、日本、安南等国经常派人到明朝学习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因“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7]3788},宋濂主修过《洪武礼制》《大明集礼》《皇明宝训》《昭鉴录》《孝慈录》和《大明律》等典籍制度,其中汇聚了前朝历代礼法文化的智慧结晶,代表当时中土最先进的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参考价值。明初朝廷多次将它们赐予各国,尤其以高丽、日本、安南三国为多,三国在研习这些典籍之时,多次派人到明朝参观学习,使者更乐于向大儒宋濂求教。通过这些优秀典章制度的外传和亲自为使臣答疑解惑,宋濂的治国思想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管理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宋濂在传播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方面也做出重要贡献。宋濂是儒学大家,其儒学思想影响域外。日本著名五山禅僧义堂周信云:“且问江南近年儒佛二氏人物。则禅林诸老往往西归,今性温恕中一人,儒

则宋景濂而已。”^{[15]106}宋濂将《大学衍义》视为“帝王之学”要籍,屡次上殿进讲,君臣多次研讨。在其影响下,高丽使臣也将之带回国,李朝太祖李成桂更是效仿明太祖,召刘敬讲解《大学衍义》。宋濂所著《周礼集注》传到朝鲜,李成桂曾下令刊印《周礼集注》和《大学衍义》,发行全国诸道。宋濂的儒学思想在明初诸国影响广泛。

元末明初,江南地区佛教兴盛,宋濂受家乡习佛理禅风气影响,喜欢参佛谈禅。他佛学造诣高深,精通内典。入朝后又多次参加朱元璋在蒋山举行的全国法会,经常与佛门高僧谈佛论道,在佛教界德高望重。来华僧侣多向宋濂讨教,其中日本僧人最多,范堂令仪、绝海中津、汝霖良佐、简中原要等日本高僧都与宋濂交往,他们从宋濂那里领略中土佛学的精深和禅宗的高妙,回国后积极传播。宋濂为推动中日的佛教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宋濂还当过道士,别号玄真子,道学深厚。他与明代道教天师张正常、张宇初交往颇多,在道教界广有声誉,对朝鲜、安南道教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朝鲜的高丽王朝和李氏王朝道教兴盛,他们与明朝的道教界交流颇多。洪武三年,朱元璋派南京朝天宫道士师昊赴高丽祭祀山川,师昊请深谙道教的宋濂作《代祀高丽国山川记》,一时宋濂文传高丽,名声大噪,促进明初东亚地区的道教交流。

宋濂的文史著作也广泛传播于海外,影响他国的文化发展。刘基云:“海内求文者项背相望,碑版之镌,照耀乎四方。高丽、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贡京师,皆问安否,且以重价购其《潜溪集》以归,至有重刻以为楷式者。”^[16]尤其主修的《元史》引起多国反响。高丽君臣经常群读《元史》,参悟其中的治国之道,诗人金时习著《读元史诗》。朝鲜官修《高丽史》时“准《元史》而作诸志”^{[17]513},越南《大越史记全书》、日本《大日本史》的编写也受到《元史》影响。宋濂主修的《洪武正韵》多次作为官方对外赐书,成为朝鲜、安南、日本最重要的汉语书籍,也是三国必备的汉语教材和科举用书,如朝鲜的《东国正韵》《训民正音》《四声通考》等书的编撰均参考过《洪武正韵》。景泰年间,出使朝鲜的文臣倪谦曾受邀为朝鲜君臣讲解《洪武正韵》十多天,随后朝鲜成功完善本国的音韵拼音方案^{[18]322-326}。宋濂的诗文更受到国外文人的追捧。《明史》云“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7]3788},日本五山禅僧天隐龙泽也称“大明诗人,余平生所阅者宋濂文粹”^{[19]824}。他应邀为日本僧人所作的《日本梦窗正觉心宗普济国师碑铭》《日

本瑞龙山重建转法轮藏禅寺记》《日本建长禅寺古先原禅师道行碑》等文,在日本禅林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宋濂的一些诗文也被编入别国的诗文总集。朝鲜正祖李祘编中土诗歌总集《诗观》,内收宋濂诗歌一百三十三首,将之列为“明诗十三家”之一^{[20]152};朝鲜文人黄景源在《江汉集》中也收录宋濂《谕中原檄》一文,并誉之为“开国第一诏”^{[21]469-470}。长期以来,宋濂的元末诗集《萝山集》在国内失传,2011年却被发现完整保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可见日本民众对宋濂诗文的喜爱与重视。日僧惟高妙安《玉尘抄》载:“宋景濂《赋日东曲》十首诗,载《梦(萝之误)山集》,十首之末作富士。”^[22]明初安南经历过一场文化浩劫,明成祖派兵征安南期间曾下令:“除释道经板经文不毁外,一切书板文字以至礼俗童蒙所习,如上大人丘乙己之类,片纸只字,悉皆毁之。”^[23]宋濂在永乐年间政治上并未平反,原先传到越南的文学作品和越南翻刻作品大多毁于此次战火,故其文在越南影响不长。

四、推动明初外交事业发展的历史意义

宋濂通过自身的海内外文化影响力和辛勤外交外事工作,在谋划明初外交准则、构建外交体系、完善外交方式、处理外交事务、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为大明开国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明初国力衰微,百废待兴。面对蒙元残敌侵扰和高丽、安南、日本、占城等国威胁,宋濂利用台阁儒臣身份,屡次谏言朱元璋将儒家的“怀柔远人”、保境安民思想作为外交原则,并带头著文宣扬明初外交政策,热情做好外交外事工作,成为洪武朝和平外交形象的代言人。《明史》云:“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7]3788}国内外使臣通过与他交往,更好地了解明初外交原则,领略大国气度,纷纷愿意与明朝交往。宋濂在世期间,海外各国纷纷来朝进贡,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十三年之前来明朝贡的国家有: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渤泥、西洋琐泥、琐泥、览邦、淡巴、吕宋等17国,其中真腊、暹罗、占城、爪哇、三佛齐、吕宋和淳泥等国在宋濂担任礼部主事期间就相继来明朝贡。宋濂的外交外事工作和道德文章美誉为构建明初朝贡体系立下汗马

功劳,也使明初和平稳定的外交思想影响深远。朱元璋晚年在《皇明祖训》明确列出大明周边15个“不征之国”名单,并告诫子孙世代遵守祖训,“和平稳定”思想遂成为终明之世的外交准则。

二是完善明初外交方式。元代外交以武力攻伐为主,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宋濂除力主儒家“怀柔远人”的外交原则外,借助自己在文学、宗教、政治上的影响力为完善明初外交方式提供重要支持。“诗赋外交”是明初外交的主流方式,当时的中朝外交就是典例,它承续发展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传统,主要通过各国使臣的诗文交往,达到增强情感的效果,宋濂与多位外国使臣的文学交往便是“诗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外交”是明初外交的重要辅助方式,宋濂与海外僧侣的交往则是“宗教外交”方式的最好体现。基于文化信仰的认同,朱元璋认为中日间的“宗教外交”效果较好:“且论其国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6]947}。他多次恩准宋濂为日僧题铭作序,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确实收效显著。“政治外交”是明初外交的非主流方式,明初对安南的外交多属“政治外交”。因安南国王狡诈欺瞒,宋濂建议对安南恩威并施、严防细查,最终和平解决安南问题。

三是促进明初各国文治水平的提高。宋濂一生致力于明初文治事业,于洪武礼制功勋卓著,其成果也被域外多国成功借鉴。洪武三年,朱元璋遣使颁科考诏于安南、高丽、占城,而明初科举制度多经宋濂完善。他修订的《大明律》和《洪武礼制》也被东亚各国广泛借鉴。1369年,高丽王朝遣使入明求教明朝祭服制度,朱元璋令工部赐之;1416年,朝鲜太宗依据《洪武礼制》详定朝鲜朝服之制;1444年,朝鲜世宗朝在《洪武正韵》基础上研制出新型的“训民正音”拼音方案。宋濂与海外文人的文学交流和其文集的流传也促进域外各国文学的发展。他称赞朝鲜外交官张子温云:“今子温之来也,应对精明,进退有度,而文采粲然可观,似无愧于前二子者。”^{[6]460}在朝鲜国内引起较大反响,其作品由此成为朝鲜文人研习的范本。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是日本五山禅僧的杰出代表,两人都奉请宋濂作文,另一日本五山禅僧天隐龙泽也云:“大明诗人,余平生所阅者宋濂文粹。”^{[19]824}宋濂与五山禅僧的宗教和文学交流,不仅促进日本禅宗水平的提高,而且推动代表日本汉文学最高水平的五山文学时期的到来。

五、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不仅闻名国内,而且传誉海外,尤其在明初日本、安南、高丽等汉文化圈名声远扬。他凭借自身的政治地位、工作便利和道德文章,为谋划明初外交准则,构建完备外交体系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其倡导与践行的“诗赋外交”、“宗教外交”方式有力推动明初各国的文化交流,促进各国政治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思想文化的繁荣,历史功勋卓著。正如方孝孺云:“公修身于户庭之间,而姓字播于千万里之外,蛮夷异类皆知尊慕之,使中国之美传于无极,其功盖大矣。”^[10]

参考文献:

- [1] 万明.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J].古代文明,2010,4(2):73-90.
- [2] 来涛.明初对外政策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9:31-43.
- [3] 谢其祥.论宋濂对朱元璋父子的教育与辅导[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26(8):92-94.
- [4] 万明.明代初年中国与东亚关系新审视[J].学术月刊,2009,41(8):129-136.
- [5] 宋濂.元史[M]//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738.
- [6] 宋濂.宋濂全集[M].黄灵庚,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7]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8] 解缙.明太祖实录[M]//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9] 吴莱.渊颖集:第五卷[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 [10] 方孝孺.宋学士续文粹序[G]//逊志斋集.宁波:宁波出版社,2000.
- [11] 日本佛书刊行会.大日本佛教全书[M].东京:大法轮阁,1978:244.
- [12] 王世贞,罗仲鼎.艺苑卮言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377.
- [13] 焦竑.玉堂丛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1:163.
- [14] 任宪晦.看书杂录[G]//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314辑.汉城:景仁文化社,2003:198.
- [15] 义堂周信,辻善之助.空华日用工夫略集[M].东京:东京太洋社,1942:106.
- [16] 刘基.潜溪文粹序[G]//宋濂.宋学士文粹.明洪武八年刊本.
- [17] 洪汝河.木斋先生文集[G]//韩国民族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124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513.
- [18] 葛平平.东亚域外汉语教科书文献考述及比较:以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朝鲜和日本为例[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18,20(3):322-327.
- [19] 天隐龙泽.翠竹真如集[G]//五山文学新集.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824.
- [20] 李祜.弘斋全书[G]//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262辑.汉城:景仁文化社,2001:152.
- [21] 黄景源.江汉集[G]//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224辑.汉城:景仁文化,1999:469-470.
- [22] 妙安,中田祝夫.玉尘抄:第35卷[M].东京:勉诚社,1972.
- [23] 李文凤.越峤书[M]//四库存目丛书:第16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695.

(责任编辑:陈丽琼)